

霸权的护持:冷战时期美国的 国家安全研究

于铁军

内容提要 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创生、1950—1970年代初期的兴起与衰落,以及1970年代中后期到1989年冷战终结期间的复兴。在第一阶段,国家安全的概念、理论和议题从无到有,并获得初步发展;在第二阶段,国家安全研究在美国学术研究机构中迅速兴起,进入“黄金时代”,核威慑理论、有限战争、军备控制等构成了该阶段国家安全研究的主要内容;在第三阶段,国家安全研究的议程变得更为丰富,研究的实证性、学术性和应用性有了较大提升。总的来看,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国家安全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关系学科下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美国国家安全研究的阶段性变化与国际环境的变迁和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相对应,体现了国家安全研究作为一门政策科学的基本属性。

关键词 国家安全研究 美国 冷战 国家安全 安全研究 战略研究

* 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100871)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在美国,安全研究通常被看作是国际关系的一个主要分支领域(另一主要分支领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①而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成立,通常以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英国威尔士大学首先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政治讲座教授的职位为标志。之所以要设立该讲座教授的职位,首要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性后果。可以说,探求战争的原因和维持和平的条件,直接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成立,并且使得战争与和平问题在后来一直居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位置,而“安全”这一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开始出现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文件当中。^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是国际体系动荡不定的20年,用E. H. 卡尔的话来说,是“危机的二十年”。到1939年,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前夜和战争当中,各国的国防事务和外交事务较之和平时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何动员全民的力量,采取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种手段来应对国家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保证国家的生存,捍卫自身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战胜强大的敌手,成为各国尤其是大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国家安全的概念由此应运而生。^③

① 国际关系中的“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广义来说,包括国家安全、国际安全、跨国安全、地区安全、全球安全、人的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相对)等范畴;狭义的安全研究一般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国际安全、跨国安全和地区安全研究,通常与军事力量的使用或威胁使用、战争研究及防务研究密切相关,故又被称为“战略研究”(strategic studies)。在当前西方学术界,通常把战略研究看作是安全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安全研究视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把国际关系又视为政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参见 John Baylis, et al., eds., *Strateg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5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3。本文主要讨论美国的安全研究和教学状况,为行文方便,除非需要特别予以区分的场合,否则将按美国的通常做法,一般不对安全研究、国家安全研究、国际安全研究与战略研究做严格的区分,而是统一称作国家安全研究,尽管这些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有所区别,参见 Richard H. Shultz, Jr., Roy Godson, and George H. Quester, eds., *Security Stud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and London, Brassey's, 1997, pp. 1-3。也有学者认为,安全和战略研究更适合被视为是政治学中和国际关系学科并立的一个研究领域而非其中的一部分,参见 Robert Ayson, "Strategic Studies,"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8, pp. 558-559。

② 在1920年生效的《国际联盟盟约》及其后签署的一系列国联文件如《布拉格备忘录》中,都曾提到“安全”问题。此处的“安全”概念,实际上是作为“和平”“没有战争”、没有外部侵略的同义词而使用的,表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开始将预防甚至制止战争作为国际社会努力的重要目标。

③ 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美国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其1943年出版的《美国对外政策:共和国之盾》一书中首次提出“国家安全”的概念,但实际上,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爱德华·米德·厄尔(Edward Mead Earle)对“国家安全”概念的使用及辨析均要早于李普曼。在1940年前后发表的多篇文章中,厄尔便使用了“国家安全”这一概念,参见 Edward Mead Earle, "American Military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53, No.1, Mar. 1938, pp. 1-13; Edward Mead Earle,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Yale Review*, Vol.29, No.3, March 1940, pp. 444-460; Edward Mead Earl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trategy for the United States,"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9, No.2, Jan., 1941, pp. 2-9。尤为重要的是,厄尔于1939—1943年(尤其是194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战略讨论班时,和他的“军事研究小组”的同事一起对“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相当系统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总体战”及战后接踵而至的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国家安全”的概念逐渐得到广泛的运用,尤其是在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通过并随之建立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一系列国家安全组织机构之后。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也得到较快发展。在美国自身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其与核武器与核战略、战争研究、外交决策等研究领域相融合,在现实中与各国的对外政策相互动,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并逐渐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站稳脚跟,成为国际关系学科中一个具有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学术领域。冷战结束之后迄今30年,随着世界政治的不断变化和国际环境的日趋复杂,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几经变化,美国安全研究的范围得到了很大拓展,研究视角更为多元,研究议题、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也变得难以清晰界定,许多问题目前仍处于争论当中。^①

讨论,其观点直接影响李普曼以及曾任美国海军部长和首任国防部长的詹姆斯·福雷斯特(James Forrestal)等美国国家安全权势集团中的人物。参见 David Ekbladh,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Edward Mead Earle and the Depression-Era Origins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6, No.3, Winter 2011/12, pp. 107-141; Dexter Fergie, “Geopolitics Turned Inwards: The Princeton Military Studies Group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Imagination,” *Diplomatic History*, Vol.43, No.4, 2019, pp. 644-670; Andrew Preston, “Monsters Everywhere: A Genealogy of National Security,” *Diplomatic History*, Vol.38, No.3, 2014, pp. 477-500。关于国家安全,在国际关系学界并无普遍接受的定义。目前用的比较多的定义是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给出的,即认为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模糊的符号”,是指在客观上不存在对一国所拥有的价值的威胁,在主观上感受不到对这些价值将遭受攻击的恐惧,简言之,即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感到恐惧。参见〔美〕阿诺德·沃尔弗斯:《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于铁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① 安全和战略研究在美国大学中的研究情况,参见于铁军:《美国大学中的国际战略研究述评》,《美国研究》2009年第2期,第113—139页。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关于安全(战略)研究领域的学术考察,参见 Colin S. Gray, *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2; Colin S. Gray: *Strategic Studies: A Critical Assessment*,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2; Joseph S. Nye and Sean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2, No.4, Spring 1988, pp. 5-27; Stephen 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5, No.2, June 1991, pp. 211-239; Richard H. Shultz, Jr., Roy Godson, and George H. Quester, eds., *Security Stud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and London, Brassey’s, 1997; Richard 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World Politics*, Vol.50, No.1, October 1997; Steven E. Mill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t Twenty-five: From One World to Anoth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6, No.1, Summer 2001, pp. 5-39; Robert Jervis, “Security Studies: Ideas, Policy, and Politics,”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Richard Sisson, eds.,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Knowledge: Democracy, Autonomy, and Conflict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00-126; 〔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余潇枫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及《安全对话》杂志刊登的对该书的多篇讨论和批评文章,参见 *Security Dialogue*, Vol.41, No.6, December 2010。关于当今国外国际安全和战略研究的基本架构、议题、研究范式和方法,参见两部在国际上采用范围较广的教科书,〔英〕阿兰·柯林斯:《当代安全研究》,第三版,高望来、王荣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John Baylis, et al., eds., *Strateg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5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概念抑或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在美国出现得最早,其后在大学和智库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开展得最为广泛,迄今为止发表的研究成果最多、最成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影响也最大,这一点在国际学术界似乎没有什么异议。^①因此,尽管本文认为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最重要的功能是护持作为“自由帝国”(Empire for Liberty)^②的美国的全球霸权——这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安全目标都迥然不同——但如果我们将国家安全理解为一种“一国防护其内在价值免受外部威胁的能力”,并进而将国家安全研究看作是一个主要研究国家如何规划、决定和评估其旨在提高这种能力的相关政策领域,^③那么,美国的做法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课程体系建设和学术研究便仍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创生发展至今,其涵盖的范围和领域、发表的学术成果,以及各种相关制度设计和政策辩论,数量已极为庞大。本文作为一篇综述性文章,且受篇幅所限,只能考察冷战时期美国的安全研究情况。即便如此,所论也难免挂一漏万,尚希读者谅解。关于冷战后美国的安全和教学情况,笔者将另文讨论。

关于冷战时期美国安全的研究和教学情况,本文拟分三个阶段做一个大致的历史梳理,具体包括:(1) 19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安全研究的创生;(2) 1950—1970年代初期美国安全研究与教学的兴起与衰落;(3) 1970年代中后期到1989年冷战终结期间美国安全研究与教学的复兴。在上述每一阶段,笔者将首先考察美国安全研究与教学发展变化的现实背景和学术脉络,然后概述其内容及重点。在结论部分,笔者将探讨冷战时期美国安全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① 参见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对战略研究领域的考察和评论,Robert Ayson, "Strategic Studies,"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8, pp. 558-575.

② Ernest May, "National Security in American History," in Graham Allison and Gregory F. Treverton, eds., *Rethinking America's Security: Beyond Cold War to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2, p. 109.

③ P. G. Bock and Morton Berkowitz, "National Security," in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11,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 The Free Press, 1968, p. 40.

一、美国国家安全研究的创生(1940年代)

在1930年代后期前,“国家安全”这一术语在美国虽然也曾出现在一些场合,甚至在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演讲中数次被提及,但其主要含义是指个人的社会经济安全,这与今天这一概念的含义多有不同,且并非其演讲重点内容。^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作为一个以自由主义为思想基底的国家,除在军事院校之外的普通高校中,与军事和战略相关的研究和教学是相当少见的。^②以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管理武力,以及运用军事手段维护国家的生存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安全”概念,是在1930年代后期随着希特勒德国和日本帝国在欧亚两端的侵略扩张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逐渐笼罩到美国时才出现的。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美国最终参战,使得军事问题迅速成为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焦点,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相关研究成果开始增多,国家安全教学和培训项目在一些大学中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1940年前后,以历史学家爱德华·米德·厄尔(Edward Mead Earle)为中心的普林斯顿大学“军事研究项目”(又称“普林斯顿研究小组”)率先对“国家安全”这一概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③经过小组成员之间相当激烈的争论,^④厄尔将“国家安全”概括为:“一种事务的状态,在此状态下,国家的领土、政治独立、权利和重大利益不受来自国外任何严重侵略的威胁,也不受为外国

^① Andrew Preston, “Monsters Everywhere: A Genealogy of National Security,” *Diplomatic History*, Vol.38, No.3 2014, pp. 487-488.

^② 芝加哥大学与耶鲁大学的项目是这方面少有的例外。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教授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领导的“战争研究”项目于1926年开始启动,旨在探讨导致战争的各种原因;后来美国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界的几位掌门人威廉·福克斯(William Fox)、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和克劳斯·诺尔(Klaus Knorr),均为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耶鲁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于1935年,成员包括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弗里德里克·邓恩,后来威廉·福克斯、伯纳德·布罗迪、和克劳斯·诺尔等也加入其中,阵容强大,是战前和战争期间大学当中安全和战略问题研究的样板。1951年,由于时任所长邓恩与新任耶鲁大学校长在研究和教学理念方面的分歧,研究所主要研究人员转移至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国际问题研究所宣告解散,参见 Paulo Jorge Batista Ramos, “The Role of the Yal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Ideology, 1935-1951,”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2003.

^③ 关于普林斯顿大学军事研究项目的情况,参见 Edward Mead Earle, “The Princeton Program of Military Studies,” *Military Affairs*, Vol.6, No.1, Spring, 1942, pp. 21-26.

^④ Dexter Fergie, “Geopolitics Turned Inwards,” pp. 654-655; 该研究小组成员包括曾经撰写美国“命运天定”论代表性著作的外交史学家阿尔伯特·温伯格(Albert Weinberg)、历史学家菲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阿尔弗雷德·瓦格茨(Alfred Vagts)、哈罗德·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等人。

控制或影响的内部势力的威胁。”^①“国家安全”概念的提出,打通了平时和战时、国内事务和国外事务、国防和外交,以及有形的物质威胁和无形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威胁之间的界限,在当时有助于美国摆脱孤立主义,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力量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其1940年底的一次“炉边讲话”中指出:“这不是一次关于战争的炉边谈话……这是一次关于国家安全的谈话……我们必须成为民主的伟大兵工厂。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种如同战争本身一样严峻的紧急情况。”^②1943年,沃尔特·李普曼在其战时出版的名著《美国对外政策:共和国之盾》中则对国家安全作了如下界定:“当一个国家不必为避免战争而牺牲其合法价值,而在受到挑战时又能够通过战争来维护其合法价值时,这个国家就是安全的。”伴随着李普曼在舆论界的巨大影响力,“国家安全”的说法不胫而走,很快成为一个流行的术语。^③

厄尔对战略和大战略概念在美国的讨论也有重要贡献。1943年,厄尔在其主持的普林斯顿军事研究小组讨论成果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一部重要的战略思想史论文集——《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希特勒》。在该书的前言中,厄尔对战略和大战略界定为:“战略是控制和使用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的种种资源、包括其武装力量的艺术,以便针对其实在、潜在或纯粹假想的敌人时能有效地促进和确保其至关重要的利益。最高形态的战略——有时被称作大战略——是指这样的东西:它将国家的各项政策和各种军备如此地整合为一体,以至诉诸战争要么成为不必要的,要么以最大程度的胜利可能来付诸实施。”^④保罗·肯尼迪认为,凭借这一定义,厄尔大大拓展了关于“大战

① A. K. Weinberg, “The Meaning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Attached Comments, n. d. [September/October 1941], Edward Mead Earle papers, Box 33, Seeley G. Mudd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NJ, cited from Preston, “Monsters Everywhere,” p. 495. 转引自 Preston, “Monsters Everywhere,” pp. 496-497.

② A. K. Weinberg, “The Meaning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Attached Comments, n. d. [September/October 1941], Edward Mead Earle papers, Box 33, Seeley G. Mudd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NJ, cited from Preston, “Monsters Everywhere,” p. 495. 转引自 Preston, “Monsters Everywhere,” pp. 496-497.

③ Walter Lippmann, *U. 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 Boston, M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3, p. 51.

④ Edward Mead Earle, “Introduction,” in Edward Mead Earle,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3, p. VIII.

略”的研究范围,将平时和战时的国家政策都包括进来。^① 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该书一直是美国战略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教科书。^②

在厄尔的推动下,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当时尚在普林斯顿任教的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撰写的《机器时代的海上力量》与《非专业人士海军战略指南》、^③斯普劳特夫妇撰写的《美国海军的崛起》《迈向海权的新秩序》及其主编的教材读本《国家权力的基础》等。这些著作当时在美国海军中有很多读者,其中,《国家权力的基础》一书曾经作为教材在当时美国海军预备役人员的培训项目中广为使用。^④

厄尔在普林斯顿大学所开展的工作也推动哥伦比亚大学在1941年开设了一门名为“战争与国家政策”的跨院系课程,该课程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格雷森·柯尔克(Grayson Kirk)为中心,并得到哥伦比亚大学以外学者的鼎力协助。^⑤ 课程的教学大纲于1942年出版。^⑥ 同年,作为“战争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芝加哥大学教授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出版了两卷本的《战争研究》。^⑦ 耶鲁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美国“地缘政治”学派的领军人物斯派克曼出版了讨论美国对外政策的经典之作——《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⑧同在

① [美]保罗·肯尼迪:《战争与和平中的大战略:拓展定义》,载[美]保罗·肯尼迪主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时殷弘、李庆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② 该书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一部战略研究的经典。此书后来由斯坦福大学教授彼得·帕雷特主持修订再版,参见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Nuclear 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6。该书中文版参见[美]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

③ Bernard Brodie, *Sea Power in the Machine Ag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1; *A Layman's Guide to Naval Strateg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2;《非专业人士海军战略指南》后来多次再版,并改名为《海军战略指南》,中译本见[美]伯纳德·布罗迪:《海军战略指南》,王哲文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④ 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The Rise of American Naval Power, 1776-1918*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9),该书中文本参见[美]哈罗德·斯普雷特、玛格丽特·斯普雷特:《美国海军的崛起》,王忠奎、曹菁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Toward A New Order of Sea Powe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0; 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eds., *Foundations of National Power: Readings on World Politics and American Securit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5。

⑤ 参见Gene M. Lyons and Louis Morton, *School for Strateg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New York, N. Y.: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5, p. 37;厄尔本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后来作为专著出版,参见Edward Mead Earle, *Turkey,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Bagdad Railway: A Study in Imperialism*, New York: Macmillan, 1923。

⑥ Grayson Kirk and Richard Stebbins, *War and National Policy: A Syllabus*,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42。

⑦ 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War*,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

⑧ 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2。

耶鲁大学的沃尔弗斯和威廉·福克斯在此前后也分别出版了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法国相互冲突的对外战略的重要著作《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和法国》和《超级大国：美国、英国和苏联——它们对于和平的责任》。^① 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遂成为美国普通高校中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的先驱。

美国全面参战之后，庞大的战争机器发动起来。1942年8月，“曼哈顿计划”正式启动，成千上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到核武器的开发当中。与此同时，大学中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也被广泛动员起来，以各种形式参与到战争中来，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帮助美国赢得战争，如后来成为日本研究经典著作《菊与刀》，本来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接受美国陆军的委托研究项目，为服务战后对日占领而对身居美国的日本侨民进行调查而产生的一项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②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在战时则加入到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OSS）担任分析研究处的主任，负责分析和研判敌国的相关情报。到1945年，仅是在华盛顿工作的分析研究处的专业分析人员就有大约500人。^③ 战争结束后，这些专业人员有的留在政府相关部门中任职，但其中大部分又回到大学原来的工作岗位。战时参加战略和情报分析的经验，为这些学者战后从事国家安全相关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④同时也促进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包括军方）之间多方面、多层次的联系。战后初期美国大学中蓬勃兴起的区域和国别研究便大大得力于政府的大力推动、全国性学术组织如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的学术规划，以及各大公益基金会的

① Arnold Wolfers, *Britain and France Between Two Wars: Conflicting Strategies of Peace since Versaill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0; William T. R. Fox, *The Super-Powers: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Soviet Union—Their Responsibility for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44。国际政治中“超级大国”这一术语便出自福克斯的这部著作。

② 〔美〕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③ William L. Langer, “Scholarship and the Intelligence Problem,” in Carl E. Schorske and Elizabeth Schorske, eds., *Explorations in Crisis: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332.

④ 美国“情报分析之父”谢尔曼·肯特战前是耶鲁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战争爆发之后加入战略情报局工作，战后先回到耶鲁大学，后长期任职于中央情报局。他于1949年出版的《战略情报为美国的世界政策服务》一书是美国战略情报的奠基之作，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官员和情报人员的必读书。参见 Sherman Kent, *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中译本参见〔美〕谢尔曼·肯特：《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刘微、肖皓元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

财政支持。^①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一颗原子弹,人类正式进入核时代。1946年,当时已在耶鲁国际问题研究所任职的布罗迪主编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讨论核武器之国际政治影响的著作——《绝对武器:原子武力与世界秩序》。^②该书包含了布罗迪本人及沃尔弗斯、福克斯等人撰写的章节,是耶鲁国际问题研究所集体合作的成果。1949年,布罗迪又在《世界政治》上刊发《作为一种科学的战略》一文,倡导将战略作为一个系统的领域加以研究,并认为战略研究是一门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性科学,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是经济学所代表的那种“硬”方法。^③

伴随着大战的结束,美国从一个内向型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外向型大国,崛起于世界舞台。面对接踵而至的激烈的美苏全球竞争及军事技术的大发展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国家安全事务研究的需求不断扩大。美国的战略研究逐渐突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基本为军人所垄断的局面,民间战略家(防卫知识分子)开始在美国国家安全的讨论与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军方对于非军人学者和学术研究的重视也上了一个新台阶。战后初期,美国国防部以及美军每一个军种都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并吸纳大量来自大学的学者参与其中——空军建立了兰德公司(1948),陆军建立了运筹研究办公室(1948),海军建立了运筹评估小组(1942)和海军研究办公室(1946),^④国防部稍后建立了防务分析研究所(1956)。这些研究机构的设立,拓展了以往军事研究的范围,密切了军队和学术界的联系,总体上也推动了国家安全研究的发展。其中,兰德

① 关于1943—1953期间美国地区研究的演进史,参见牛可:《地区研究创世十年:知识构建、学术规划和政治—学术关系》,《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1期;关于战后美国“苏联学”研究的兴起,参见David C. Engerman, *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viet Exper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 Bernard Brodie, ed., *The Absolute Weap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6, 中译本参见伯纳德·布罗迪等:《绝对武器》,于永安、郭莹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托马斯·谢林曾高度评价布罗迪,称他是那些以“设想不可能设想的事”为业的人(即核战略家)当中的“第一名——无论是从时间上来说还是从杰出程度上来说”。参见Thomas Schelling, “Bernard Brodie (1910-1978),”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 No.3 Winter 1978-1979, pp. 2-3;实际上,与《绝对武器》一书同年出版的讨论核武器战略影响的还有另一部著作,参见William Liscum Borden, *There Will Be No Time: The Revolution in Strateg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6, 并且这部著作也并不乏颇具洞察力和想象力的论述和分析,但现在已鲜为人知。

③ Bernard Brodie, “Strategy as a Science,” *World Politics*, Vol.1, Issue 4, July 1949, pp. 467-488.

④ Harvey M. Sapolsky, *Science and the Navy: The History of the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公司的创立尤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对1950年代美国战略研究尤其是核战略研究的贡献可能比当时任何一个大学都要大。^①

对于学科发展而言,学术期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一时期有两家重要的国际关系期刊《国际组织》(1947年创刊)和《世界政治》(1948年在耶鲁大学创刊,后编辑部转至普林斯顿大学)相继创办。虽然这两本期刊主要是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学术期刊,但刊发的论文很多都与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有关,对国家安全研究的推动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但对战后初期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教学推动最大、最直接的,还是“杜鲁门主义”出台和美苏开启冷战背景下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的通过及“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的建立。^③ 根据《国家安全法》,设立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建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这些部门与既有的国务院,共同构成了战后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主要架构。《国家安全法》第二条特别指出,“国会通过本法旨在为美国长远的国家安全提供一个综合性的计划;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政府部门、机构和职能部门在制定完整的政策和程序方面提供法律依据”等。^④ 1947年《国家安全法》的通过和一系列国家安全部门的设置与调整,扩大了对于国家安全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为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相关部门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创造了条件。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到战后初期这一段时间,是国家安全研究在美国的创生阶段。在这一阶段,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和世界战略相伴生,国家安全的概

① 关于兰德公司,参见 Bruce L. R. Smith, *The RAND Corporation: Case Study of a Nonprofit Advisory Corpor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Alex Abella, *Soldiers of Reason: The RAND Coope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Harcourt, Inc., 2008.

② 1983年,克劳斯·诺尔曾经将《世界政治》上历年刊发的有影响的论文汇编成论文集《权力、战略与安全》出版,所收论文均为安全和战略领域的论文,参见 Klaus Knorr, ed., *Power Strategy, and Security: A World Politics Rea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③ 关于“国家安全国家”及战后初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讨论,参见牛可:《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 Daniel Yergin, *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7; [美]梅尔文·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④ 参见黄爱武:《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232页。《国家安全法》这部法律的名称以及将各种机构冠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本身也说明了“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新兴概念的重要性。此前,国家安全所涉及的事务更多地表述为“军事事务”“国防事务”“外交事务”和“外交政策”。参见 P. G. Bock and Morton Berkowitz, “The Emerging Field of National Security,” *World Politics*, Vol.19, No.1, October 1966, pp. 121-123.

念、理论和议题从无到有,并获得初步发展。国家安全研究在美国学术界逐渐占有了一席之地,同时,也使得这一研究领域带有明显的政策科学属性,且与霸权护持、国防和武力的运用密切相关。这一特点既为国家安全研究带来了动力、活力和现实相关性,也给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带来了各种挑战,有时甚至会导致其误入歧途。

二、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教学的兴衰 (1950年代—1970年代初期)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初,是美苏冷战不断加剧、之后又逐渐走向缓和的时期。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建立、朝鲜战争、1952年和1953年美国与苏联氢弹试验相继成功、1957年苏联的“斯普特尼克”冲击、1958年和1961年两次柏林危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及1964年之后美国逐渐深陷越南战争,现实世界中美苏之间、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此起彼伏的激烈竞争,使无论是美国社会大众还是专家学者对国家安全事务都给予更大的关注。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美国大学中的国家安全研究与教学快速兴起,进入所谓“黄金时代”,之后又随着越南战争期间民众对政府政策的失望及安全研究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而饱受批评,并于1970年代初期陷入低谷。

美国安全与战略研究的“黄金时代”主要是指1950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美国以核战略、威慑、军备控制和有限战争为中心的安全研究。^①与此前的时代相比,从军事技术方面来说,最显著变化是核武器的出现和人类进入核时代尤其是热核时代。核武器的诞生、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以及核战争的梦魇促使各国政治家、军人和民间战略家们深入思考核条件下战争形态、战争方式甚至战争的性质等一系列问题。由于人类从未经历过核战争,^②所以,与以往战争不同,关于核战争的思考就其性质而言更多是抽象的、理论性的,而非具象的、经验性的,人们只能依靠核爆炸的各种技术参数来提出和验证核战争的各种假设,这使得关于核战略和威慑理论的讨论更适合运用演绎推理、博弈论

^① 关于美国战略研究的“黄金时代”的起止时间有多种说法,包括的内容也有所不同,此处取科林·格雷的说法,参见 Colin S. Gray, *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Lexington,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2, p. 45。

^② 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的原子弹,由于不存在核交战,所以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核战争。

和复杂计算,而非以前为军人职业所特别倚重的战场经验,从而使得智库和大学中从事安全和战略研究的专家学者比职业军人在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方面具有更大优势。^①

在这方面做出重要学术贡献的民间战略家包括兰德公司的布罗迪、^②数学家艾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和物理学家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从普林斯顿转到兰德然后又转至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威廉·考夫曼(William Kaufmann),从芝加哥大学转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对外政策研究中心的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 Osgood),哈佛大学的基辛格和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克劳斯·诺尔和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等。^③ 这些文人战略家考察了核威慑的含义和性质、设计了制止侵略行为和防止冲突升级为热核战争的各种替代性战略,并就如何控制武力的使用、如何发展核力量来维持美苏之间的相互威慑等建立起一套高度发达的理论。^④ 由他们所发明的一系列概念,如“打击力量”“第一次和第二次打击能力”“军备竞赛的稳定性”“相互确保摧毁”“灵活反应”“逐步升级”和“有限核战争”等,对美国政府的核战略产生了很大影响,^⑤并且这些概念和理论直到今天仍在运用,也仍然是国家安全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内容。^⑥ 在这些文人战略家当中,布罗迪凭借自己对新技术发展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的敏锐观察,在1946年率先讨论了核武器的战略影响之后,又首次对“斯普

① 这方面常被援引的一个例子是,1960年代跟随麦克纳马拉到美国国防部担任要职的兰德公司的经济学家阿兰·恩托文在与一位将军争论核战争计划时反唇相讥说:“将军,我打过的核战争和你一样多。”意思是关于核战争,军人并不比民间战略家有更多的经验。参见 Fred Kaplan, *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83, p. 254。

② 布罗迪1951年转职到兰德公司,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66年。

③ 诺尔是耶鲁国际问题研究所于1951年解散之后从耶鲁大学转往普林斯顿大学的。

④ 关于这些核战略家的生平、学术思想及政策影响,参见 Fred Kaplan, *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83; John Baylis and John Garnett, eds., *Makers of Nuclear Strategy*,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1。关于这一时期美国核战略的演进,参见[英]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黄钟青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该书英文原版首版于1981;[美]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⑤ Nye and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p. 9; Trachtenberg, *Hist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p. 1。

⑥ 近几年,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日益加剧,当年美苏博弈的思想理论、政策实践和经验教训,重又引起各国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关注,如最近威慑、危机管理等问题在美国、中国 and 日本的学术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讨论。即便是新近出版的国家(国际)安全和战略研究领域的教科书,一般也都设有专门的章节涵盖这些内容。参见 Alan Collins, *Contemporary Security Studies* (6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John Baylis, et al., eds., *Strateg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7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尼克时刻”之后所谓“导弹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问题进行分析;^①考夫曼(当时尚在普林斯顿大学)通过质疑艾森豪威尔政府倡导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威慑战略的可信性问题上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②基辛格和奥斯古德较早系统讨论了核时代有限战争的可行性和重要性;^③沃尔斯泰特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讨论了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面对苏联核打击时所具有的脆弱性,并进而分析如何才能提高美国核武器的生存率和战略威慑力;^④卡恩以其丰富的想象力迫使人们思考“不可设想”的核战争的可能性,较为系统地讨论了核时代国家之间从危机到冲突再到战争的逐步升级战略,以及核战争条件下国家安全防御涉及的非军事领域所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⑤格伦·斯奈德较早深入讨论了威慑与防御的关系;^⑥而谢林则通过其一系列著作的出版使军备控制成为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⑦

① Bernard Brodie, *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中译本参见:〔美〕伯纳德·布罗迪:《导弹时代的战略》,军事科学院外军研究部译,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出版部 1961 年版。

② William W. Kaufmann, ed., *Military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该文集包含了考夫曼本人撰写的几篇重要的、带有原创性的论文。考夫曼另一本重要著作是《麦克纳马拉战略》,参见 William W. Kaufmann, *The McNamara Strateg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4, 中译本参见〔美〕威廉·考夫曼:《麦克纳马拉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译印,1965 年版。

③ Henry Kissinger,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7; Robert Osgood, *Limited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④ Albert Wohlstetter, “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 *Foreign Affairs*, Vol.37, Issue 2, January 1959, pp. 211-234; 沃尔斯泰特的夫人罗伯塔·沃尔斯泰特也是在兰德供职的著名学者,其 1962 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关于“珍珠港事件”中美国情报失败的研究是情报学研究中的一部经典著作。该书中文本参见〔美〕罗伯塔·沃尔斯泰特:《珍珠港:预警与决策》,张魁译,北京:金城出版社 2020 年版。沃尔斯泰特夫妇两人的重要论文,参见 Robert Zarate and Henry Sokolski, eds., *Nuclear Heuristics: Selected Writings of Albert and Roberta Wohlstetter*(无出版日期和地点);关于其战略研究遗产的讨论,参见 Ron Robin, *The Cold World They Made: The Strategic Legacy of Roberta and Albert Wohlstett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⑤ Herman Kahn, *On Thermonuclear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Herman Kahn, *Think about the Unthinkable*, New York: Horizon Press, 1962; Herman Kahn, *On Escalation: Metaphors and Scenarios*, New York: Praeger, 1965; 后两部著作在 1960 年代即出版了中译本。关于卡恩生平及其热核战争研究的历程,参见 Sharon Ghamari-Tabrizi, *The Worlds of Herman Kahn: The Intuitive Science of Thermonuclear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⑥ Glenn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⑦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Thomas Schelling and Morton Halperin, *Strategy and Arms Control*,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1; 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Lyons and Morton, *School for Strategy*, pp. 45-46。军备控制作为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的一个次级领域,早期有代表性的文献还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刊《代达罗斯》1960 年发行的关于军备控制问题的特刊, *Daedalus*, Vol.89, No.4; Donald G. Brennan, ed., *Arms Control, Disarma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61。

除核战略、威慑理论和军备控制等与核武器紧密联系的研究之外,1950年代至1970年代初,在美苏全球冷战、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和美国逐渐陷入越战泥潭的背景下,美国对苏联、中国、越南等被认为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重点国家的战略研究,以越南战争为核心的有限战争和“反叛乱作战”研究,^①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对外政策)组织和决策过程研究也发展起来,^②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研究机构而言,与此前创生期相比,这一时期美国国内安全与战略研究的版图有所变化。在核战略和威慑理论研究方面,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研究机构可能是兰德公司。第一代核战略家大多都有在兰德工作的经历,而后来这些代表性人物纷纷离开兰德转到大学任教,又推动了相关知识的传播。^③普林斯顿大学前期有厄尔的国家安全研究为基础,后来在厄尔的努力下,又有邓恩所带领的原来耶鲁国际问题研究所骨干成员的加盟,研究力量得到很大加强。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以克劳斯·诺尔为代表的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对战争潜力、经济动员、游击战、北约战略及核威慑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并编辑出版了大量相关著作,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的重镇。^④

① 关于冷战时期特别是1960年代末美国军方资助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的“反叛乱作战”研究,参见 Joy Eohde, *Armed with Expertise: The Militarization of American Social Research*,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②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可能是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的《决策的本质》,该书英文首版于1971年,参见 Graham 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MA: Little and Brown, 1971。中文版是基于1999年出版的英文第二版翻译的,参见[美]格雷厄姆·艾利森、菲利普·泽利科:《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王伟光、王云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综合讨论国家安全决策的著作,可参见 Morton H. Halper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Analyses, Cases, and Proposals*, Lexington, MA: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75。

③ 在美国空军资助下于1948年成立的兰德公司,被认为是冷战时期美国安全与战略尤其是核战略研究的学术重镇,但兰德公司的核战略研究骨干大多来自大学,后来也多数转往大学。在活跃于1950和1960年代的兰德公司的有代表性的民间战略家中,布罗迪受教于芝加哥大学,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等从事研究工作,后转往兰德公司,最后又回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沃尔斯泰特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在兰德工作了12年之后转往芝加哥大学任教;谢林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也是该校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四位创立者之一,其在兰德公司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是利用自己的学术休假来进行的;威廉·考夫曼先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战略研究,后到兰德公司,最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亨利·罗文(Henry Rowen)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后长期在兰德公司从事研究和管理工作,最后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参见 Baylis and Garnett, eds., *Makers of Nuclear Strategy*, pp. 1-135。

④ Klaus Knorr, *The War Potential of N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中译本参见克诺尔:《战争潜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出版部1962年版; Klaus Knorr, *NATO and American Secur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Klaus Knorr, *On the Use of Military Power in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Klaus Knorr, *Military Power and Potential*, Lexington, MA: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70; Lucian W. Pye, *Guerrilla Communism in Malaya: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Mean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成立于1951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在同样是成名于耶鲁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威廉·福克斯的长期领导下,聚焦于那些能够影响国家安全长远政策的基础性研究,如对战争原因和防务决策的研究,催生了沃尔兹的《人、国家和战争》、亨廷顿的《共同防御》和华纳·希林等人的《战略、政治与防务预算》等重要成果。^①1951年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②在第三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③国际传播、^④共产主义研究,^⑤以及美国对外政策、军事政策等研究领域迅速崛起。^⑥1958年成立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⑦也组织和资助出版了一系列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如布热津斯基的《苏联集团》、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谢林和托马斯·霍尔珀林共著的

①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Samuel H. Huntington, *The Common Defense: Strategic Programs in 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Warner Schilling, Paul Hammond, and Glenn Snyder, *Strategy, Politics, and Defense Budge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② 关于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早期的活动,参见 Donald L. M. Blackmer, *The M. I. 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Founding Year 1951-1969*, Cambridge: 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2。

③ Max Millikan and Donald L. M. Blackmer, eds., *The Emerging Nations: Their Growth and United States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61; Lucian Pye, *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 Analytic Stud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66; Lucian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68; Lucian Pye and Sidney Verba,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Myron Weiner, *Party Building in a New Nation, Party Building in a New Nation: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马克斯·米利肯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经济学家,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助理局长。白鲁恂(Lucian Pye)和迈伦·维纳后来均成为美国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也分别是中国和印度研究的顶尖学者。两人的学术成果、培养的学生,以及在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SSRC)比较政治委员会中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均对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④ Ithiel de Sola Pool, *Politics in Wired Nations: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Lloyd Etheredge,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Lucian Pye, ed.,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伊锡尔·普尔是1950—6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界的重要人物,在国际传播、内容分析、计算机编码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研究。

⑤ Douglas Pike, *Viet Cong: The Organization and Techniques of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of South Vietna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66; Donald L. M. Blackmer, *Unity in Diversity: Italian Communism and the Communist World*,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68.

⑥ Max Millikan and Walt Rostow, et al., *A Proposal: Key to an Effective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s & Brothers, 1957; Ithiel de Sola Pool, et 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National Security: A Report Prepared by the Research Group in Psych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63; Harvey Sapolsky, *The Polaris System Development: Bureaucratic and Programmatic Success in Govern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⑦ 关于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前25年的情况,参见 David Atkinson,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Harvard'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8-198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战略与军备控制》，由中心主任罗伯特·鲍维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共同撰写前言的《共产主义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以及当时在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的法国“反暴乱”问题专家戴维·加鲁拉撰写的《反叛乱战争：理论与实践》等。^① 从上述名校毕业的学生在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初期陆续进入到美国其他大学的其他院系中任教，从而推动了国家安全研究和教学在大学中的开展。

如果说在战后初期美国大学中完整的安全研究的专业设置还极为少见的话，那么，随着教授该课程的教员的目的不断增加，到1960年代末，在美国已经大约有十几所大学可以提供安全研究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学位课程；有更多的学校可以开设一门或者几门课程。^② 在此过程中，由纽约大学国家安全项目教授弗兰克·特拉格(Frank Trager)主持的大学教员安全研究暑期研讨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该暑期班每年举行，连续举办了将近十年时间。这些暑期班及学术会议聚焦于如何教授安全课程，如防卫政策、政军关系等。暑期班项目还出版了一系列出版物，包括教学板块、教学大纲、参考书目，以及相关教学法等，对国家安全教学的普及做出了贡献。^③ 基于前期的准备，1973年出版了由弗兰克·特拉格和菲利普·克罗嫩伯格主编的教材《国家安全与美国社会：理论、过程与政策》，其中包括“国家安全研究的性质和范围”“关于国家安全、防务和战争的各种观点”“国家安全政策过程”“国家安全过程中的战略”“国家安全过程的社会影响”等五部分，选文含诺尔、布罗迪、亨廷顿、奥斯特古德等人的多篇文章。^④

其他较早出版的国家安全方面的教材还有：1965年出版的莫顿·博考维茨和P. G. 罗克主编的《美国国家安全：理论与政策读本》，包括“国家安全概念

① 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Soviet Blo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Henry A. Kissinger, *The Necessity for Choic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1; Thomas Schelling and Morton Halperin, *Strategy and Arms Control; Communist China 1955-1959: Policy Documents with Analysis*, with a Foreword by Robert R. Bowie an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David Galula, *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all Mall Press, 1964;

② Shultz, Godson, and Quester, "Introduction," in Shultz, Godson, and Quester, eds., *Security Stud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 5.

③ Ibid.

④ Frank N. Trager and Philip S. Kronenberg, eds., *National Security and American Society: Theory, Process, and Policy*, New York: The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Program of New York University, 1973.

的产生”“国家安全与国际冲突:零和博弈”“国家安全与国际合作:非零和博弈”“国家安全领域的发展”四大部分,选文作者包括汉斯·摩根索、沃尔弗斯、布罗迪、奥斯古德、诺尔、谢林、希林等人。^① 1971年出版的罗伯特·阿特和肯尼斯·沃尔兹主编的《武力的使用:国际政治与对外政策》,包括“能力与学说:关于武力使用的理论”“武力使用案例研究”“武力使用中的创新与落伍:根据能力调整战略”“对使用武力的限制:军备竞赛中的对等互动”“控制武力的成功与失败”等五部分,选文作者包括奥斯古德、格伦·斯奈德、谢林、哈尔柏林、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亨廷顿、希林等人。^② 可见,前期国家安全的研究成果通过教科书进入大学的课堂,推动了国家安全教学工作的开展。

国家安全研究和教学在高等院校的推广、大学和智库等相关研究机构数目的不断增加,使可供政府选拔的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学者的人数有所上升;同时,这些机构又可以吸纳了不少离开政府部门的官员和专家从事研究工作,并为希望未来进入政府相关部门工作的专业人士提供暂时的工作岗位,从而逐渐形成了国家安全领域的“旋转门”制度。这种人员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信息的交流虽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但通过大学、智库和政府之间的人员交流,产出了相当多的理论与政策相结合的国家安全研究成果。1950年代到1960年代期间国家安全研究和教学的人员、机构和成果的不断增长,标志着国家安全在美国从一个初创和探索的领域逐渐向一个较为完整意义上的学科的方向发展。^③

国家安全研究在美国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国家安全本身概念和涵盖范围的模糊性、国家安全许多议题本身具有高度的技术性,也由于研究者通常来自许多不同的学科,还由于各种经常性的保密需要,直到1960

^① Morton Berkowitz and P. C. Rock, eds.,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A Reader in Theory and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两位作者博考维茨和洛克还是1968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之“国家安全”词条的撰写者,参见 Bock and Berkowitz, “National Security,” in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11, pp. 40-45.

^② Robert J. Art and Kenneth Waltz, eds., *The Use of Forc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1;该教材多次修订再版,迄今仍在使用,只不过因为前些年沃尔兹去世,主编者换成了阿特和一位年轻学者,参见 Robert Art and Kelly M. Greenhill, eds., *The Use of Force: Military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8th editio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5.

^③ 详细介绍,参见 Gene M. Lyons and Louis Morton, *Schools for Strateg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5; Berkowitz and Bock, eds.,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年代末,国家安全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学科体系而在美国获得稳定发展。两位学者在考察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后指出:“不同的学者对于各种问题以不同的方式来加以处理,使用的方法也多种多样,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不一而足。迄今为止,关于国家安全的概念的界定,以及如何使其在操作层面上具有意义,或者将国家安全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边界的划定,都还没有做出多少努力。但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开始出现,或者至少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从制度上还是从思想上来看,都是明白无误的。”^①

从政策效果来看,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美国学术机构中的安全与战略研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可以说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一时期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政府国家安全部门之间的互动非常活跃。这部分得益于由人员网络所形成的政策网络的作用。^②1961年上台的肯尼迪政府的国家安全团队,包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副助理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总统科学顾问杰罗米·威斯纳(Jerome Wiesner)、^③还有几位助理国防部长和助理国务卿等重要职位,均由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兰德公司的民间战略家担任。^④麦克纳马拉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也将很多兰德公司专家如查尔斯·希奇(Charles Hitch)、阿兰·恩托文(Alain Enthoven)等延揽至国防部担任重要职务。这些被称作“神童”的思想、系统分析方法和工作方式,以及它们帮助麦克纳马拉建立的国防资源配置系统,即规划、立项、预算系统(PPBS),^⑤都对美国国防部的体系能力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使美苏之间的直接对峙达到顶点。危机解除之

① Bock and Berkowitz, “The Emerging Field of National Security,” p. 124.

② 罗伯特·杰维斯认为自己算是考夫曼这个网络上的成员。而围绕在沃尔斯泰特周围的则有曾任小布什总统时期国防部副部长的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在后来长期担任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在美国国防战略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参见 Robert Jervis, “Security Studies: Ideas, Policy, and Politics,” p. 101; Andrew Marshall, et al., *On Not Confusing Ourselves: Essays o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 Honor of Albert and Roberta Wohlstett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③ 关于威斯纳任职总统科学顾问期间的情况,参见游战洪:《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威斯纳》,《科学》2012年第1期,第49—53页。

④ Thomas Schelling, “Academics, Decision Makers, and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A Comment on Jervis,”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Richard Sisson, eds.,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Knowledge: Democracy, Autonomy, and Conflict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37; 另参见〔美〕戴维·哈尔伯斯坦:《出类拔萃之辈》,齐沛合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版。

⑤ 关于PPBS,参见〔美〕阿兰·恩索文、韦恩·史密斯:《多少才算够?:1961—1969年国防项目顶层决策》,尹常琦、殷云浩译,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后,美苏之间开始就军备控制问题展开沟通,并于1963年签订《部分核禁试条约》,东西方竞争的焦点开始转向第三世界,尤其是越南。在此背景下,许多民间战略家的关注点也随之转向以越南战争为核心的有限战争和“反叛乱作战”问题。^① 美国为维护自己的世界霸权而在越南战争中推行的诸如“反叛乱行动”“战略村”等丧失人心的政策,加上1960年代末欧美大学校园普遍爆发的激进思潮,使得安全与战略研究一时在美国大学中声誉扫地,师生之间的对立和民间战略研究界的分裂不断加剧。^② 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和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都曾受到不明炸弹的攻击和学生示威者的冲击。而1970年代初期美苏两国走向缓和,又使此前作为战略研究领域主要关注点的威慑问题暂时丧失了紧迫性。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与武力运用和政府决策密切相关的安全与战略研究走向低谷,相关专业即便在当时名校的招生录取当中也成为冷门。^③

在1950—1960年代中期以兰德公司的博弈论和系统分析方法为代表的安全与战略研究模式如日中天的时候,以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和初出茅庐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为代表的重视国家安全政策的决策过程与案例研究的做法可谓另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④ 当时还在哈佛大学任教的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关于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和错误认知的微观层面的政治心理学研究,以及其对“安全困境”概念的进一步阐发,也是对战略研究领域的一大贡献。^⑤ 另外,阿诺德·沃尔弗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的华盛

①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兰德公司战略家埃尔斯伯格从一名热心于核战略的“冷战斗士”到对“反叛乱作战”情有独钟,最终又变身为“五角大楼文件”的当事人和“吹哨者”,其个人经历是这一段历史的很好注脚。参见〔美〕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吹哨者自述:五角大楼文件泄密者回忆录》,邢杰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② Walter Isard, ed., *Vietnam: Some Basic Issues and Alternatives*, Cambridge, MA: Schenkman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③ 当时即便是哈佛大学的安全研究方向,也很少有学生愿意选择报考。笔者对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所长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的访谈,2019年6月2日。

④ 以分析古巴导弹危机为主要内容的《决策的本质》一书成为决策研究和对外政策研究的经典。该著作作者为格雷厄姆·艾利森,但主要是基于哈佛大学以梅为核心的学习会的讨论成果而完成的。

⑤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该书是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出版的,中译本参见〔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杰维斯在这方面的另一本力作,参见〔美〕罗伯特·杰维斯:《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徐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该书英文首版于1970年。

顿对外政策研究中心邀集了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奥斯古德等传统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围绕当时国际政治中的同盟问题展开研究,留下了不少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研究成果。^①

关于这一阶段美国的战略研究,美国战略研究资深学者理查德·贝茨后来评论道,“战略研究在第一个周期的理论突破更多地是来自于威慑、核战略和逐步升级理论,而不是革命、干涉和非常规战争。第一个周期战略研究的缺点是,绝大多数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最不可能发生的战争类型上面,而对于最可能发生的战争类型的关注却姗姗来迟”。^②英国战略史、军事史研究学者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则批评道,在美国有关核武器和威慑理论的论著中,不仅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因素消失殆尽,甚至连作战层面的因素也难得一见,核武器的技术能力被看作是本身便具有决定性,以至于现实冲突的政治动机、相关的社会性因素乃至军事战斗本身都不在考虑之列,这种做法有可能会带来灾难。^③赫德利·布尔一方面批评指出,“很多战略分析所达到的技术上的严密性和精确性是以牺牲战略与政治多样性及变化之间的联系为代价的”,^④但他同时也认为,后人即使不接受这些文人战略家的研究成果,至少也会把它们看作是解决问题的严肃的尝试。^⑤

总之,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在战后美国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中迅速兴起,并在1950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进入“黄金时代”。这期间核战略、威慑理论、军备控制、有限战争理论等构成了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其影响至今可见。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初,受越南战争和美国大学中的反战运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安全与战略研究走向低潮,但外交决策过程分析、认知理论等与外交实践密切联系的国家安全次级领域的研究开始崭露头角。

^① Arnold Wolfers, ed., *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9; George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Robert Osgood, *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8.

^② 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p. 15. 同时期一位美国学者对1950—60年代美国核威慑理论特别是对谢林和卡恩的批评,参见 Philip Green, *Deadly Logic: The Theory of Nuclear Deterrenc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8.

^③ Michael Howard, “The Forgotten Dimensions of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57, No.5, Summer 1979, p. 982. 本段内容引自于铁军:《美国大学中的国际战略研究述评》,《美国研究》2009年第2期,第121页。

^④ Hedley Bull, “Strategic Studies and Its Critics,” *World Politics*, Vol.20, No.4, July 1968, p. 600.

^⑤ *Ibid.*, p. 605.

三、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教学的复兴 (1970年代中后期到1989年冷战终结)

伴随着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的爆发、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布林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国经济力量的相对下降,以及这一时期以1975年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为标志的东西方关系的缓和,1950—1960年代以核战略和威慑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国际政治现实之间的脱节日渐显现,一些学者开始质疑军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在美国大战略中的主导地位,重新思考国家权力的构成要素以及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更加注重经济力量、国际合作和能源安全等问题。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1977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一反传统安全研究以一国安全为中心,以军事力量为构成国家权力之首要因素的研究路径,强调跨国相互依赖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国家和武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下降,并在国际关系研究界产生了很大影响。^①但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宣告了美苏之间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缓和进程的终结。1982年里根政府上台,对苏采取强硬政策,美苏开启“新冷战”模式,双方争霸的焦点集中于欧洲的防务问题。在此背景下,就国际关系的“大理论”而言,以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在与以相互依赖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对峙中又暂时赢得了上风。相应地,作为国际关系一个分支领域的安全研究,重视战争指导和军事力量博弈的“传统派”亦卷土重来,军备控制、常规威慑、战略情报等研究领域取得新进展。1985年之后,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掌苏联政权,倡导“公开性”和“新思维”,美苏关系又再次进入缓和阶段,直至1989年苏东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格局走向终结。

从当时国内环境来看,1970年代中后期美国渐渐从越南战争后遗症中恢

^①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在此之前,该书的一些主要思想已经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国际组织》等杂志上,并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资助下于翌年出版了单行本,参见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5, No.3, Summer 1971;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该书以后多次修订再版,中文版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复元气,国家安全问题重新成为国家议程上的优先事项,学术界对安全研究这一学科的认识也有所改观,研究兴趣又开始增加。1976年《国际安全》杂志创刊,^①并很快发展成为安全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阵地,可以被视为是国家安全研究在美国开始复苏的一个重要标志。^②

《国际安全》杂志的创设有赖于福特基金会对哈佛大学的大笔资助。为提振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曾任肯尼迪政府时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麦乔治·邦迪在其负责福特基金会期间,拨巨款给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等大学设立军备控制研究机构。^③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现为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学院的防务与军备控制项目(Defense and Arms Control Studies Program, DACS,现在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 SSP 的前身),以及斯坦福大学的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中心(CISAC)等即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70年代中后期建立起来的。^④这些中心致力于整合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技术专家,以及具有政府、外交、军事和工商业经验的实际工作者的知识、技能和洞见,开展跨学科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讨论美苏军备控制谈判的著作,对此前提出的一些理论进行了有价值的验证和补充,并开设本科和研究生层次上的军备控制课程,为新时期美国国家安全

① 关于《国际安全》创刊的背景、办刊宗旨和其后的发展情况,参见 Steven E. Mill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t Twenty-five: From One World to Another*”。从1984年开始,《国际安全》编辑部经常将该刊刊发的一些高质量的论文按照主题汇编成册,出版发行,成为大学当中安全研究专业重要的阅读文献,如 Steven E. Miller, ed., *Strategy and Nuclear Deter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Idem, *Military Strateg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② 关于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主要区别,国家安全主要是从一国政府的视角来考察安全问题,其首要关注是某一国家生存和福祉问题,使用或/和威胁使用武力被认为是保护自身生存的主要工具。这一路径出自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传统,按照这一传统,国家被看作是无政府或者半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国家通过发展自身的力量、对外结盟、缔结军控条约,以及其他多边安排来推行本国的安全政策;国际安全则明确承认存在安全困境,并认为一国安全与其他国家的安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将军事力量的集体运用看作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尽管国际安全这一概念也出自现实主义传统,这一路径相对于国家安全的概念而言对国际制度和机制予以了更多的重视,参见 Shultz, Jr., Godson, and Quester, “Introduction,” p. 2。目前,在美国学术界,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两个概念并存使用,重合部分颇大,统称为“安全研究”,国际安全的概念使用更广泛一些。在政府文件当中,国家安全的概念似乎用得更多一些。

③ McGeorge Bundy, “Statement on Paul Doty,” October 28, 1983, Folder 21, Box 32, Paul M. Doty personal archive,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④ 笔者对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创立者之一、中心首任共同主任约翰·刘易斯教授(John W. Lewis)的访谈,2005年8月10日。1970年,由斯坦福大学各个学科的近20名教员组成了跨学科的斯坦福军备控制小组,为本科生开设军备控制课程。1976年,该小组在教学基础上出版了一本军备控制的教材,这是美国大学中比较早的,参见 John Barton and Lawrence Weiler, eds., *International Arms Control: Issues and Agreem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研究与教学打下了基础。

在此前后，塔夫茨大学的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于 1971 年建立了国际安全研究项目，乔治城大学于 1977 年设立了国家安全研究项目，马里兰大学于 1983 年也设立了类似的项目。^① 到 1980 年代后期，很多大学已经能够提供完整的国家安全的研究生教育。

就研究和教学内容而言，从 1970 年代中后期到 1980 年代末，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与教学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②

1. 情报研究。由美国国防部资助的哈佛大学教授欧内斯特·梅主编的《洞悉敌手》一书，运用大量历史资料对两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列强对本国对手的战略情报评估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可为当前美国的战略判断提供借鉴。^③ 另外，1979 年在国际问题研究协会 (ISA) 情报研究分会的提议下，民间组织“国家情报研究中心”(National Intelligence Study Center) 从 1980 年开始对大学中的情报教学和研究情况进行调查；^④ 1985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设立“驻校情报官员”制度，向大学中派驻情报专家，协助开设情报专业课程，^⑤ 美国大学中情报教学与研究作为国家安全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遂取得较快进展。

2. 对核武器、核战略及威慑理论的实证分析。如亚历山大·乔治和理查德·斯莫克对威慑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实际运用进行了系统考察；^⑥ 斯科特·萨根运用新解密的材料对美国核战略中建立在 20 世纪 60 年代核理论基础上的政策推论进行了验证；^⑦ 约翰·刘易斯和薛理泰对中国核武器开发

① Shultz, Jr., Godson, and Quester, "Introduction," p. 5.

② 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pp. 17-20; Mill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t Twenty-five," pp. 5-25; Nye and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pp. 15-20; Stephen 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pp. 216-222.

③ Ernest May, ed., *Knowing One's Enemy: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④ Majorie W. Cline, ed., *Teaching Intelligence in the Mid-1980s: A Survey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Courses on the Subject of Intelligenc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tudy Center, Washington, D. C., 1985; Wilfred D. Koplowitz, *Teaching Intelligence: A Survey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Courses on the Subject of Intelligenc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tudy Center, Washington, D. C., 1980.

⑤ John Hollister Hedley, "Twenty Years of Officers in Residence,"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Vol.49, No.4, 2005.

⑥ Alexander L.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⑦ Scott Sagan, *Moving Target: Nuclear Strate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史的研究；^①理查德·内德·勒博和罗伯特·杰维斯则对作为理性威慑范式核心的完全信息及理性计算模式提出了质疑。^②

3. 围绕常规战争战略、同盟问题和战略评估问题的争论。如核条件下常规战争的重要性、常规威慑的要求、常规军事力量的平衡及其测量方法、国家采取不同常规军事战略的原因，^③同盟的起源、运行与管理，^④以及运用何种方法进行战略评估才能更为准确和有效等。^⑤

4. 从历史和政治角度进行的政策反思和大战略研究。如欧内斯特·梅对美国决策者在对外政策中对历史的运用和滥用所做的考察，^⑥以及他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诺伊施塔特共著的对决策者应用历史情况的案例研究；^⑦耶鲁大学教授约翰·加迪斯对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的研究，^⑧罗伯特·吉尔平、

① 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中译本参见〔美〕约翰·刘易斯、薛理泰：《中国原子弹的制造》，李丁等译，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1年版。

② Richard Lebow, *Between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中译本参见〔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赵景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Robert Jervis, *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idem, *The Illogic of American Nuclear Strate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③ John 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Barry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中译本参见〔美〕巴里·波森：《军事学说的来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英国和德国》，梅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Jack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上述著作均出版于康奈尔大学出版社。该出版社出版的“安全研究丛书”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史和国际政治丛书”，是当前美国最有影响的两个安全与战略研究的丛书系列。丛书前后主编，如Robert Art, Robert Jervis, Stephen Walt, John Lewis Gaddis, Jack Snyder, Richard Ullman, John Ikenberry, Marc Trachtenberg等都是安全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

④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34, No.3, July 1984, pp. 461-495.

⑤ 关于安德鲁·马歇尔对美国国防战略的影响及其“净评估”方法的介绍，参见〔美〕安德鲁·克雷佩尼维奇、巴里·沃茨：《最后的武士：安德鲁·马歇尔与美国现代国防战略的形成》，张露、王迎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

⑥ Ernest R. May, “Lessons” of the Past: *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⑦ Richard E. Neustadt and Ernest R. May, *Thinking in Time: The Uses of History for Decision-Maker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6.

⑧ 〔美〕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增订本），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保罗·肯尼迪和阿伦·弗里德伯格关于大国兴衰的研究,^①以及马克·特拉亨伯格对美国核战略的历史研究等。^②

5. 经济安全与综合国力研究。尽管早在1943年出版的《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一书中,厄尔便指出,经济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是治国理政中最关键、最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③但在1977年出版的《经济问题与国家安全》一书的前言中,诺尔和特拉格仍然慨叹,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中仍然是一个“被遗忘的研究领域”,该书的出版的部分目的便是要弥补这一缺憾。^④此时期出版的国家安全研究成果显示,在1970年代以后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美国对经济安全的关注大大加强了。^⑤这一时期有关综合国力的研究,特别是由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克莱因提出的“综合国力方程”,也表明美国对国家力量和国家安全的理解和思考比以前要更为全面、系统和深入。^⑥

6. 危机管控研究。冷战过程中美苏之间多次爆发危机,使得危机管控作为一种维护国家安全、处理彼此矛盾的中层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有亚历山大·乔治和理查德·内德·勒博等。他们以美苏之间发生的许多危机为案例,深入探讨避免危机升级和冲突解决之道,总结出一套危机管控的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产生了重要的政策影响。^⑦

① [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梁于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Aaron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② Marc Trachtenberg, *Hist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③ Earle,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 117.

④ 参见 Klaus Knorr and Frank N. Trager, eds., *Economic Issues and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The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Program of New York University, 1977, “Foreword,” p. V。经济安全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后来很多刊发在《国际组织》期刊上。关于冷战时期的经济与国家安全领域的学术成果, 详见 Michael Mastanduno, “Economics and Security in Statecraft and Scholarship,” in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9, pp. 185-214。

⑤ 参见 Samuel P. Huntington, ed., *The Strategic Imperative: New Policies for American Security*, Cambridge, MA: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Harold Brown, *Thinking about National Security: Defense and Foreign Policy in a Dangerous World*,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3。在亨廷顿和曾任美国国防部长、物理学家哈罗德·布朗的著作中,经济政策和能源问题都单独列章,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阐述。

⑥ Ray S. Cline, *World Power Trend and U. 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80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0; Idem, *World Power Assessment 1977: A Calculus of Strategic Drift*,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77; Idem, *World Power Assessment*,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75。

⑦ 参见 Alexander L. George, ed., *Managing US-Soviet Rivalry: Problems of Crisis Preven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3; Alexander L. George, Philip J. Farley, and Alexander Dallin, eds., *US-Soviet Security Cooperation: Achievements, Failures, Less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Alexander L. George, ed., *Avoiding War: Problems of Crisis Management*,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1; [美]勒博:《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

7. 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研究。其中,包括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的概念、来源及演变、发挥作用的途径、优势及弱点,以及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运用等等。虽然这方面的研究更多涉及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但安全机制、安全制度与国际之间的安全合作自此也成为战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①

8. 新的安全议题的研究。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理查德·厄尔曼 1983 年在《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的《重新界定安全》一文认为,美国冷战时期对安全的定义“极为狭隘”“极端军事化”,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资源的争夺和跨国移民、日益减少的资源等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冲突,因而也都是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②

总之,从 1970 年代中后期到冷战终结这段时期,国际战略态势的起伏变化较为频繁,导致美国国家安全研究议题、理论和方法呈现多样化发展。如果说此前阶段美国的安全研究主要关注核战略、核威慑和军备控制,集中于对苏军事政策方面,那么,本阶段安全研究的议程要更为丰富,研究的实证性、学术性和应用性都有了较大的提升,对一些概念和理论的辨析也更加深入细致;在研究方法上则出现了从博弈论和系统分析向比较历史案例研究回归的趋势。同时,随着冷战逐渐走向尾声,要求进一步拓宽安全研究的领域,使之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的呼声日渐增高。相比于越南战争时的困难状况,美国国家安全的研究与教学可以说重新走向兴旺。

四、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教学的特点与不足

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创生于 1940 年代,在 1950—1970 年代初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在 1970 年代中后期到 1989 年冷战终结前后这段时间又逐渐走向复兴。这半个世纪是美国国家安全研究的奠基时期,可以说,直到今天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大影响,值得认真加以研究。驱动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演进的因素,既包括国际大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冷战时期美苏争霸

^① Stephen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尤其是其中罗伯特·杰维斯撰写的有关“安全机制”的章节,该文 1982 年首发于《国际组织》;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② Richard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8, No. 1, Summer 1983, pp. 129-153.

态势的变化,又包括美国大战略调整的影响,还有国家安全作为国际关系学科下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产生之后,其本身所具有的知识社会学的生长逻辑,包括国家安全议程、理论和方法的逐渐体系化,以及研究和教学的制度化。在此过程中,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教学呈现出一些特点,也凸显出一些不足。

(一) 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教学的特点

第一,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具有强烈的政策属性和军事色彩。美国的安全研究是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战后美苏冷战背景下快速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世界大战和冷战中,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竞胜对手,是推动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使得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与军事力量的使用和威胁使用方面,并随着国际环境和自身力量的变化而呈现出阶段化的特征。在美苏冷战高潮的20世纪50和60年代,美国的安全研究集中于核战略、威慑理论和军备控制等几个较为狭小的领域,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进入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其安全研究所涵盖的议题则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但主流研究仍将重点放在传统安全议题上,虽然军事色彩有所淡化。

第二,经过50年的发展,美国的安全研究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通过聚焦冲突和战争的根源、军事力量的威胁、使用和管理,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基本形成了一个边界较为合理、内部联系较为紧密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就其内容而言,国家安全研究是一个以政治学为主,涉及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律和心理学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涵盖国家安全战略、对外政策、防卫计划、国防开支、情报、危机管控等重大公共政策议题,但也并非面面俱到。

第三,在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教学体制经过长期磨合,在议题、方法、组织、人员、经费、管理、政策影响渠道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有章可循的模式。这套模式至少在三个方面实现了有效运转:(1) 促进专业知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即充分利用文人战略家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护持“自由帝国”美国的安全;(2) 培养和储备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领域的高级人才,保证处于维护国家安全这样的关键位置上的人员具备必要的素质和能力;(3) 服务社会,引导公众理性地认识涉外公共政策问题。这种集研究、教学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做法,是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机构的共同特征,也是我国国家安全体系能力建设可以有所借鉴的地方。

第四,国家安全研究和教学机构发挥影响的途径大致包括以下几种:(1)通过大学和科研机构教学研究人员直接出任政府职务而对政策制定及实施产生影响,如曾出任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曾出任国防部长的詹姆斯·施莱辛格和哈罗德·布朗;(2)通过研究成果(包括著作、论文和政策报告等)的发布影响政府决策,如沃尔斯泰特和考夫曼;(3)通过撰写报刊评论、接受电视采访、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政策咨询等引导公众意见;(4)通过培养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专业人才、实现知识再生产而持续发挥自身的影响力。

第五,从研究路径上来看,美国的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机构基本上都采取跨学科的方法,从事与国家安全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不过究竟跨哪些学科,在哪些方向上用力,具体采用何种方法,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二) 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研究与教学的不足

显然,美国的安全研究亦存在不少问题。美国有活跃的战略思维,强大的战略研究队伍,雄厚的研究资金,密切的政府与学界的互动,但却屡屡在诸如越南、伊拉克、阿富汗这样的问题上栽跟头,虽然这并不一定是因为国家安全研究和教育所直接导致的问题,但恐怕也不能完全摆脱干系。事实上,无论是美国学术界自身,还是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对美国的安全研究与教育都多有批评。^①

作为最早从事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的顶尖学者,布罗迪在开始的时候还希望战略研究发展成为一门像经济学那样“硬”的科学,但越南战争还没结束,布罗迪便已经对自己曾经主张过的那种安全研究路径进行了自我否定。他直言不讳地批评自己在兰德的同事,认为“他们并不是没有时间来参照历史,而是任何高度发达的科学的信奉者……常常倾向于对其他领域表现出一种蔑视甚至是傲慢。”^②他相信如果不将更多的常常被科学家认为是“软”的知识纳入到战略研究中来,单凭经济学自身是无法提高战略研究的质量的。^③

在1990年代,美国大学中从事安全研究的专家学者曾专门讨论过冷战时

^① Michael C. Desch, *Cult of the Irrelevant: The Waning Influence of Social Science on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② Bernard Brodie, “Why Were We So (Strategically) Wrong?” *Foreign Policy*, No.5, Winter 1971-1972, p. 154.

^③ 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p. 16.

期美国安全研究与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从安全研究领域创生到1989年为止的第一代安全研究的课程设置及其所立基的学术文献存在以下弱点：^①

第一，过于强调抽象的威慑理论及其在全频谱冲突中的运用。这一视角既统领了安全研究领域的理论化的方向，也影响到相关政策研究。与之相对的是，对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各种行为体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关注过少。这种研究范式错误地假定，起初从欧洲的核对峙和常规力量对峙以及从美苏之间的双边对抗中发展起来的那些概念也应该可以容易地运用到其他地区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关系中，并且对于小规模常规和非常规冲突也都同样适用，而事实并非如此。

第二，对军事力量在和平时期从事的非战斗行动关注不够。这些新的任务和使命包括武装说服、维和、前沿部署、人道主义救援，以及对其他国家的援助等。在那些并不面临紧迫安全威胁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国家的军事力量建设中，这些非战斗行动很可能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第三，研究和教学集中于美国、欧洲和苏联，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几乎被完全排除在外。安全研究领域的发展和演进没有对非欧洲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安全和国际安全的重要性予以足够的重视。

第四，一般的安全研究对文化和价值观之于冲突、战略和冲突解决的影响关注太少。尽管全球相互依赖在不断加强，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仍将持续存在，并对政府、次政府集团和跨国行为体产生重要影响。评估和预测冲突及其解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理解基于不同的政治、宗教、民族、传统的社会之间的文化和价值观差异。

第五，安全研究领域过于植根于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这导致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发生的历史研究关注不够，而这些研究本来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当前和未来的一些问题。能够为文人战略家提供职业发展的机会大多集中于当前的问题，这加剧了他们对历史的忽视。另外，安全研究领域一般为政治科学家所主导，而他们的关注点一般又是政策导向的。然而，随着对相互确保摧毁的关注相对下降和对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同安全和冲突形式的关注的上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历史研究的需求变得更为紧迫了。

^① Shultz, Jr., Godson, and Quester, "Introduction," pp. 6-7.

第六,安全研究也忽视了权力和影响力的非军事工具的运用。情报研究只是在近几年才开始取得进展,对世界历史中许多行为体所使用的隐蔽行动和其他安全政策的非军事工具的研究也才刚刚进入安全研究领域的主流。未来需要更多关注的议题包括跨国信息和安全项目、技术转移、政治影响力行动和宣传,经济政策,以及金融制度等。

美国学者自己所做的这些诊断与英国资深战略研究学者科林·格雷所指出的美国战略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颇为一致,如对历史重视不够;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差异重视不足;“美国例外论”培育了一种危险的、傲慢的战略文化;过于机械和总试图用技术手段来规避战略和政策上的难题,导致战略研究的“非政治化”,如威慑、有限战争和军备控制可谓冷战时代美国战略研究的三大理论支柱,美国学术界包括各大学的国际战略研究机构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却很少有人去分析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产生危机和战争的政治原因,等等。^①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出在美国唯我独尊的“美国例外主义”上,这导致其大战略目标设置失当和对外政策过分意识形态化,从而经常把美国战略引入歧途。^②

近几年,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所作所为又使人们对美国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重新加以审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将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安全研究可以改进之处归结为五点:其一是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其二是需要把经济学与政治学知识相结合;其三是加强历史方面的学习;其四是要具备“大局观”,保持战略思维;其五是大学要保持相对独立立场和批评精神。^③ 可见,理论与实际脱节、过度经济理性化和技术化、对历史重视不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和语言了解有限,过度意识形态化,一直是美国安全与战略研究的痼疾。问题是,如果霸权护持这一大战略目标不变的话,这些痼疾改起来也是十分困难的。

① 例如,[英]科林·格雷:《核时代的美国战略》,载[美]威廉森·默里等主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618—628页。

② 王缉思:《中国国际战略研究视角的转换》,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0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③ 参见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2/20/americans-ir-schools-are-broken-international-relations-foreign-policy/>,2022-10-11。